



【步履寻章】
时钟已逝

□文鹄

早晨,我给电子时钟充电时,发生了意外。它突然黑屏,罢工了,右下角显示电量的红色指示灯一直亮着,不闪烁也不消失。

这难道是它求救的信号吗?可是,不管我怎么摆弄,怎么施救,插上充电器又拔下来,打开开关又关上,它要么黑屏以对,要么显示乱码一团,反正再也显示不出时间了。最后我宣布时钟“死亡”,中止治疗。那一刻,我的心颤了一下,万分不舍。

这块时钟跟我已有七年多了吧。它掌管着时间,我在家里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归它指挥。到了起床的点,首先看到它的“媚眼”,然后才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;到了出门的点,孩子被我催促着穿鞋、戴红领巾、背起书包,“都几点了,再不走就迟到啦”;到了下班的点,回家换上宽松的睡衣,不急不慢地品尝晚餐的美味;到了睡觉的点,“不早了,明天还得上班,快睡吧”,依依不舍与今天说再见。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凝结着温馨的琐碎。

这个时钟属于声控唤醒的那种,平时它默默“睡”着,只要我发出清脆的一声咳嗽,它便立马从睡梦中醒来,显示出亮晶晶的时间数字,如同生命的一丝曙光,让我活在清醒与踏实之中。

与这块时钟的相遇纯属偶然。

我对钟表的选择极为苛刻,只因我的睡眠太过挑剔。

起初,我卧室里用带指针的挂钟,哪怕商家宣称绝对静音,闭上眼睛躺在床上,依然能听见时间流淌的滴答声。当搅得我心烦意乱、忍无可忍的时候,只好把挂钟里的电池抠下来,看时针还怎么转动。

之后,换成了不带指针的电子钟表。白天尚能看清数字,到晚上却如同瞎子,尤其是夜里醒来,想知道几点,看看还能不能睡个回笼觉,它在关键时刻却沉默了,漆黑一片,爱莫能助。

再后来,又换了一块带夜光的挂钟。那幽幽的绿光在漆黑长夜里格外亮眼,像被一只饥饿老狼的眼睛盯着,让我浑身发毛,睡意全无。这块夜光表只坚持了一天,第二天就被我“辞退”了。

转机源自于一次出差,宾馆客房床头柜上摆放的时钟吸引了我。它状如一块横放的手机,比手机略长一些,厚度却是手机的三倍,因此能稳稳地立在桌面上。妙就妙在它具备声控功能,平常屏幕是黑的,但只要发出动静,明亮的时间数字立刻显现。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这不正是我所需要的那款时钟吗?

没有丝毫犹豫,我立马下单同款。这就是如今意外“死亡”的那块时钟。它如同一位忠实的朋友,伴我走过七年多的光阴,与我一同经历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它将看不见、抓不住的时间具象化,让时光流淌成一条河。

如今,这块时钟毫无征兆地离我而去,让我仿佛陷入了时间的黑洞。它正常使用时,常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;一旦失去,才倍感珍惜。尤其是深夜醒来,当我习惯性地咳嗽一声,谁来为我点亮时间呢?

当务之急,是再选个一模一样的时钟。可是在网上搜了半天,也没找到同款。电子产品迭代太快,这个款式可能早已停产。

看吧,一个小小的意外,竟让我方寸大乱。是我太敏感,还是太恋旧?或许都有,但更深层的,是我不愿意从失去、从过去中走出来。

我试着说服自己,别那么执着了,也别这么讲究了,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。就算找到了同款,又能怎样呢?它也不再是陪伴我七年的老伙计。

时钟坏了,可以买个新的。可是生命呢?一旦逝去,可就永远回不来了。想到这里,我忽然释然——真庆幸啊!我还算年轻,还健康地活着,还可以为家庭、为社会做一点事情。不管曾经的时钟能否“复活”,时间始终向前,生活依旧继续,我愿意与时间温柔相处,珍惜每一个当下,相伴终老。

□赵阿芳

母亲常说,怀我那年的雪特别大。

家里穷,三间茅草房漏风,一车家当里最值钱的是半袋玉米。父亲就想了些主意:上山摘松球,送到县城早市,城里人喜欢用这个引火。于是大雪封山的日子,母亲揣着我这个四个月大的“小包袱”,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父亲往山里走。

“有一次啊,”母亲后来总爱讲这段,“雪把路都埋了,我一脚踩空,就从坡上滚下来了。”每次她说到这里总要停顿一下,眼睛望向远处,像是回到了那会儿:“当时吓得呀,手护着肚子,心想,完了完了,这小苗怕是要颠出来了。”

“结果呢?”我急急地问。

“厚厚的雪,像棉花垛一样接住了我呀,傻孩子。”母亲看着我的憨样儿,笑了。

而我长吁了一口气,似乎这只是个故事,可这个结局我也挺满意。

“一准是雪厚爱咱们家。”母亲最后总是这样总结。

从那以后,我看雪的眼神都不一样了——这哪是普通的雪,分明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雪花本身,就够孩子研究一个冬天的。

我试过伸手去接,还没数清几个角呢,就在掌心化成了水珠。

后来我学聪明了,把父亲的军大衣铺在磨盘上,这样雪花落上去,能多停留片刻。这下可看清楚了——真的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!有的像鹿角,枝枝杈杈;有的像花朵,瓣瓣分明。它们静静地躺在绿色的粗布上,晶莹剔透,边缘闪着微光,然后缓缓融化,最后消失无踪。

那时我就常想:天上一定有位特别有耐心的神仙,拿着水晶刻刀,一片一片地雕刻这些易逝的艺术品。不然怎么解释这么精美的东西,就像不要钱似的往下撒?

待到上学识字后,读到鲁迅先生的《故乡》。别的没记住,单单记住了闰土雪地捕鸟那段。

扫开一片雪,露出地面,支起家里筛面粉的大箩筐。短棒系上父母打苇箔的麻绳,一直拉到堂屋门后。筐底下小心翼翼地撒一小把小米,金黄金黄的,在白雪衬托下格外诱人。

我躲在门缝后面,屏住呼吸。麻雀们精得很,先在远处的柴火垛上观望,交头接耳,像是在开作战会议。终于有胆大的跳过来,啄一口,立刻飞走。如此反复试探,才渐渐围拢过来。

拉绳时机最难把握。有时心急,拉早了,麻雀“轰”地散开;有时犹豫,麻雀吃饱了扬长而去。偶尔真扣住了,掀开一条缝伸手去抓,那小东西在手心里扑腾得厉害,心跳快得像是要蹦出来。羽毛软软的,身子热热的,一双小黑豆眼睛惊恐地看着你。最后总是心一软,手一张,看它箭一般重新射向灰白的天空。

说起玩雪,我们能玩出好多花样。

堆雪人必须要有创意。松球眼睛,胡萝卜鼻子,这些是标配。关键是要给雪人找个身份——有时是村里的老爷爷,戴顶破草帽;有时是我们的老师,插根树枝就是教鞭。

打雪仗是最不讲规则的。说好了分两队,打着打着就成了混战。我姑家表哥最喜欢欺负我,总爱把雪团塞进我后脖颈。那滋味——一股凉气顺着脊梁骨往下蹿,能让人一蹦三尺高。衣服里化了雪,湿漉漉地贴着背,回家少不了挨一顿说,可当时只觉得痛快,哪还顾得上?当然,最刺激的要数村边河道的那段天然滑梯了。

那是段背阴的河坡,冰结得又厚又光。我们折几枝松枝垫在屁股底下,坐稳了,后面的人一推,“味溜”一声就滑下去了。风在耳边呼啸,雪沫子打在脸上,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,又一下子落回肚子里。笑声和尖叫声震下树梢一堆雪,扑簌簌,落在了童年的心里。

滑雪的代价是傍晚回家时,棉裤湿漉漉的,并且屁股那块总是磨得发亮。母亲一边给我烘棉鞋棉裤,一边教训我:“成天这么野,长大了没人要你。”

棉裤在灶火旁烤着,散发出暖烘烘的潮气,混着烤地瓜的甜香,那就是我记忆中冬天最妥帖的味道。

等河面的冰结得厚实了,又是另一番天地。

姥爷会拿出他的宝贝家什——那是他亲手做的陀螺。选一截结实的圆木,上半截成圆



柱,下半截削成圆锥。最精巧的是在锥尖嵌一颗滚圆的钢珠,这样在冰上转起来才利索。陀螺顶上加了个小铁罐,一转就嗡嗡作响,像只勤劳的小蜜蜂。

鞭子也是特制的,一根两尺长的木棍,一头系着布条编成的绳。玩的时候,先把鞭绳一圈圈缠在陀螺腰身上,无名指和中指托着锥部,大拇指轻轻按在顶部,摆稳在冰面上。手腕一抖,鞭子一抽——“嗡”的一声,陀螺就活了。

陀螺在冰面上跳起舞来,开始有些摇晃,挨上几鞭子后就稳了,越转越欢实。嗡嗡声随着转速变化着调子,时高时低,像是在哼着什么古老的童谣。你要不停地抽打它,力道要匀,角度要对,抽重了它会跳起来,抽轻了它又慢下来。太阳照在冰面上,白花花晃眼,我就追着那个旋转的小东西,一圈又一圈,忘了冷,忘了饿,忘了时间。冰面上留下一圈圈细细的鞭痕,像是时光走过的印记。

有时几个孩子会凑在一起比赛,看谁的陀螺转得久。各色的陀螺在冰面上嗡嗡作响,你追我赶,偶尔撞在一起,“啪”的一声各自弹开,又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继续转。输赢不重要,重要的是那份专注——整个世界就剩下你,你的陀螺和那片白茫茫的冰。

此刻,这场胶东大雪已经下“冒烟”了。儿子从书房探出头来:“妈,雪下大了!我们可以堆个雪人了。”

“当然。”我说,“不过你得答应我,堆个特别一点的。”

“堆什么?”

我想了想:“堆个摘松球的女人吧。”

“摘松球?什么意思?”

我笑了:“这是个很长的故事。走,边堆雪人边讲给你听。”

雪还在下,它们见过我母亲年轻时的模样,见过我童年时在冰面上抽陀螺的专注,见过我们滑冰坡时的疯狂,如今又来陪伴我的孩子。这些洁白的小精灵,就这样默默见证着人间的故事。

而每一个雪天,都是时光给我们的礼物——它让我们慢下来,停下来,回头看看来时的路。看看那个在雪地里捕鸟的孩子,看看那个在冰面上追着陀螺跑的少年,看看那些冻得通红却满是笑容的脸庞。然后继续往前走,身后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,等着下一场雪来轻轻覆盖。

就像姥爷做的那个陀螺,总会在某个冬天,在某个孩子的鞭子下,重新嗡嗡地转起来,唱着那首永远不会老去的歌谣。雪落无声,人间喧嚣,而我们都在其中,完成着微小而确切的传承。